

# 何以身體？何種政治？

## ——評深町英夫《教養身體的政治：中國國民黨的新生活運動》

● 樂兆星



深町英夫：《教養身體的政治：中國國民黨的新生活運動》（北京：三聯書店，2017）。

### 一 導言

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內憂外患阻礙着現代國家建設的順利進行。在此情境下，1934年2月

蔣介石在南昌發起「新生活運動」（以下簡稱「新運」）。這場運動最鮮明的特點是以復興中國古代固有道德即「禮義廉恥」為內容，進行生活革命，使國民依照「禮義廉恥」的德性而生活。新運官方指導文件《新生活運動綱要》所附的〈新生活須知〉，除對禮、義、廉、恥的意涵分別加以闡釋外，還對國民的衣、食、住、行作了詳細的道德要求<sup>①</sup>。新運最初以「規矩」、「清潔」為主要目標，其後，進一步擴展到「三化」運動，即「生活軍事化」、「生活生產化」、「生活藝術化」。此後，新運受到中央和地方的高度重視，從南昌一隅擴展到全國，席卷了大部分區域，影響了各種職業群體，迅速成為一項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新運服務於抗戰事業，演變為一個與戰地服務、難民救濟、傷兵慰問、保育童嬰、徵募物品等戰時支援有關的運動。抗戰勝利後，國共內戰爆發，國民黨政權在戰爭中節節敗退，無力兼顧新運，以致運動的實踐愈來愈少，最後名存實亡。至國民黨結束在大陸的統治為止，新

1934年蔣介石在南昌發起「新生活運動」。這場運動以復興中國古代固有道德為內容，進行生活革命，迅速成為一項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新運持續了十五年之久，不僅持續時間長，而且覆蓋了國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深町英夫基於身體史研究的視角，全面展現了新運異彩紛呈的畫面。本書所研究的人物相當廣泛和多元；研究主題涵蓋了思想、政治、社會、軍事等多個層面；研究區域不僅未限於南昌一隅，而且包括中央與地方之間的互動。

運持續了十五年之久，不僅持續時間長，而且覆蓋了國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與共產黨經常嫻熟地開展群眾運動相比，國民黨發動的群眾動員可謂極少。那麼，蔣介石和國民政府為何會發動如此大規模的新運？這場運動是如何展開的？又留下了哪些未竟的歷史課題？在既有研究新運的專著中，關志鋼的《新生活運動研究》對新運的基本理論、組織與人事等作了論述，並系統考察了運動推行的歷史全過程<sup>②</sup>。溫波的《重建合法性：南昌市新生活運動研究（1934-1935）》聚焦於在南昌展開的新運。他認為新運是一場救亡救國的民族復興運動，被蔣介石用來重建新政權的合法性基礎<sup>③</sup>。此書中的「合法性」是指人們對統治存在之意義所形成的一種普遍信仰、普遍信任和普遍認同。王曉華的《「模範」南昌：新生活運動策源地》選取了大量有關南昌新運的老照片，圖文並茂地展現了這一場大規模政治風暴中的發動者、運動者和被運動者。此書認為新運的真正目的是整齊劃一地控制國民的思想和行動，以便更好地維護和鞏固蔣介石的獨裁統治<sup>④</sup>。段瑞聰的《蔣介石與新生活運動》則系統地研究了新運發起初期以及抗戰時期的組織構造與蔣介石權力之基礎的建立和滲透，反映了蔣介石近代國家建設的理念<sup>⑤</sup>。

然而，上述著作有的關注宏觀問題，寫法比較中規中矩，讀起來難免枯燥乏味；有的只關注短暫的時間段，研究地域僅限於南昌一隅，從而不能完整地呈現出運動發展的歷程；有的側重於探討新運中

蔣介石權力的生成和變化及其國家建設的理念，缺少對新運中底層人物態度和觀念的探討。由此，關於新運的研究，有待學者以獨特的、全新的視角去探索和開拓。

日本學者深町英夫為系統研究新運作出了多重的努力。2017年，他親自把自己於2013年用日文寫就的著作《教養身體的政治：中國國民黨的新生活運動》（引用只註頁碼）翻譯成中文出版<sup>⑥</sup>。與上述研究專著相比，深町英夫基於身體史研究的視角，全面展現了新運異彩紛呈的畫面。以此視角出發，本書所研究的人物相當廣泛和多元；研究主題涵蓋了思想、政治、社會、軍事等多個層面；研究區域不僅未限於南昌一隅，而且包括中央與地方之間的互動。本書如講故事般娓娓道來，又不失學理性，不僅研究內容非常廣泛，研究視角頗為新穎，而且研究主旨融貫始終。

作者在〈後記〉中提到，之所以研究新運，是因為在哈佛大學留學期間，看到古色古香的《新生活掛畫》上的標語時，產生了一種不可思議的「既視感」。這些標語與他在二十世紀80年代於中國旅行時所看到的標語非常類似（頁294）。這似乎表明，歷史雖歷經滄海桑田，但仍有其連續性，新運所力圖達致的目標在後革命年代的中國仍未完成。本書的〈序章〉表達了一個既簡單又根本性的疑問：「國民黨政權何故發動並持續了這種略帶膚淺、瑣碎之嫌的啟蒙運動？而且，它何以發展成為如此大規模的全國性群眾運動？」簡言之，「國民黨政權何故且如何企圖介入、干預中國人民的日常生活？」（頁3-4）

以往的研究並不能給作者一個十分明確的答案。深町英夫認為，新運的聚焦點在於中國人的「身體」，是國民黨政權為「教養」國民的身體，並以此適應近代的嘗試。由此，「圍繞身體的政治」這樣一場「群戲」（頁8）得以在民國歷史中上演。

## 二 圍繞「身體」的敘事

本書最鮮明的特點是圍繞各種「身體」展開敘事，並且研究維度多元，不僅關注新運在國內開展的情況，也關注日本人對這場運動的看法；不僅關注國民黨內部圍繞運動展開的政治鬥爭，也關注捲入運動中的各種各樣的底層人物。

本書由前篇、中篇、後篇、末章四部分構成，前三篇共分為七章。前篇「主題」講述了新運的前史及早期狀況，闡明了運動的基本性質，包括孫中山對國人舉止動作的論述、蔣介石負笈日本所接受的身體之教養、在新運中發揮重要領導作用的黃仁霖在美國所接受的教育，以及晏陽初所開展的平民教育運動。這些均構成了新運的歷史背景。運動的發起者重新詮釋了中國古代「禮義廉恥」的理念，具體規定了國民身體舉止的方方面面，以實現和維持日常生活中的「規矩」和「清潔」。

新運在抽象的道德理念方面承繼了中國傳統思想，卻在實質上要求國人的行為舉止完全仿效近代的「身體美學」和「公共意識」（頁36-37），這似乎是一種弔詭。作者把當中的原因追溯到中西方身體意識之間存在差異：「古代中國的禮法

基本上是各種不同社會地位的人在非日常性儀式上相互扮演各自的具體角色之做法」，而並非像西方那樣「是抽象的個人在日常生活中與非特定多數的陌生人共同構成、維持一個社會的方法」（頁35）。西方和日本對中國的衝擊或侵略使國民黨領導人觀察到國人身體意識的落後。通過教養國民的身體，形塑近代國民，使中國擺脫在世界秩序中的落後地位，成為新運的主旨和目標。

在國民黨內部派系林立、全國統一未完全實現的情況下，新運卻如星火燎原般在各地推進，發展成全國性的群眾運動。作者認為，蔣介石的領袖威望發揮了極大的作用。為推動新運的全面展開，蔣介石成功煽動了親信派系之間的競爭，促使這些派系經由運動向他盡忠。他還迫使國民黨內的競爭對手如西山派、改組派參加這場運動，把它們整合在運動的體制之中。此外，蔣介石以承認具有地方勢力的領導人物既有的統治地位為誘餌，要求他們贊同和參加新運，以確認和推進雙方之間的互惠型「恩庇—侍從」關係，進而提高自己領導全國各省市黨政軍機關的領袖威望，促成對原有體制的改編。為推進新運的實施，國民政府以職業集團為社會的基本單位，把新運的原則和精神作為各種職業的標準。為教養國民的身體，在「檢查」、「調查」、「糾察」、「指導」、「勸導」等名義下，黨政機構屢次進行檢閱活動，使國家直接介入社會生活的最細微之處。然而，這些檢閱活動並沒有切實考慮到國民實際需求和切身利益，往往變成強制性干涉，由此，

本書最鮮明的特點是圍繞各種「身體」展開敘事，研究維度多元，不僅關注新運在國內開展的情況，也關注日本人對這場運動的看法；不僅關注國民黨內部圍繞運動展開的政治鬥爭，也關注捲入運動中的各種各樣的底層人物。

作者緊緊圍繞着新運中各種各樣的身體展開敘事，但他並未僅停留在對事件平鋪直敘之中，而是特別關注和着重展現事件的政治意義，以突出新運通過教養身體創造近代國民的主題。

國民經常對運動採取陽奉陰違的態度。

日本是新運的思想來源之一，也是運動發軔的幕後主角。蔣介石發起新運的目的之一便是創造軍事化的國民，進而抵抗日本的侵略。在中篇「插曲」中，作者分析了從「九一八事變」到抗戰全面爆發期間日本人對新運的反應，討論了日本外交當局及民間輿論對新運的認識，「描繪出走向對華全面戰爭時期日本人之中國觀的一端」（頁120）。日本外交當局「疑心生暗鬼」，把新運詮釋為蔣介石企圖確立在中國獨裁地位的群眾動員活動。日本官方非常警惕新運是否會伴隨着抵制日貨運動或轉化為排日運動，而日本的民間輿論對新運表現出各種各樣的態度，體現了議論者本身的思想 and 政治傾向。不論是日本外交當局還是民間輿論，都急於做出肯定或否定的評價，這種「兩者擇一」式的判斷讓日本人忽視了新運「長期抵抗」的特點以及運動的近代性質，也「並未考慮到更加重要的本質性問題，即正處於國民創造、國家建設的近代化過程當中的中國和已較早地建立起近代國民國家的日本應該如何相處」（頁141-42）。日本因為缺乏對中國的理解，最終傾注了大量軍力，陷入侵略戰爭的深淵。

後篇「變奏」介紹了在抗戰爆發到國民黨政權崩潰的過程中，從新運中派生出來的三種活動。第一種活動聚焦家庭，以婦女和兒童為關注對象，促成家庭形態的轉變。經過「女獨主內」或「女亦主外」的爭論，這場活動逐漸提倡「公育」以及「家庭社會化」的作用，通過

發展託兒所事業、安排婦女就業等途徑，促使婦女參與到抗日建國的事業之中。第二種活動聚焦於軍事，關注在官民各界的支持下，為戰爭中的傷兵提供服務的「傷兵之友」運動。通過建立傷兵管理處、成立傷兵服務團體等活動，國民政府試圖把「傷兵之友」運動籌劃進新運之中。但由於傷兵與民眾之間存有的「身體差距」以及兩者未能在國家、民族的立場上具有共同意識，該運動的目的——實現傷兵與民眾之間相互理解的融洽關係——始終未能實現：「傷兵之友運動並未試圖轉換社會結構及民眾意識，創造出『均質的國民化的身體』……並藉此使傷兵問題得到根本性的解決。」（頁217）第三種活動聚焦於支援中國抗戰的美國人，關注向駐華美軍提供住宿、飲食、娛樂的戰地服務團。戰地服務團的活動和新運之間形成的鮮明對比，更能彰顯出新運教養國民身體的效果。一方面，與中國士兵惡劣的生活條件相比，美軍有不斷關注士兵身體狀態的「哲學」，使軍隊的各種活動納入統一有序的管理之下；另一方面，儘管物資供應缺乏，但國民政府盡可能為美軍提供良好的待遇，以維持自己作為主人的「面子」。駐華美軍由此成為中國人的「奢侈的保鏢」（頁218）。

通過對本書的簡介，可見作者緊緊圍繞着新運中各種各樣的身體展開敘事，但他並未僅停留在對事件平鋪直敘之中，而是特別關注和着重展現事件的政治意義，以突出新運通過教養身體創造近代國民的主題。作者為甚麼會採取「身體」的視角進行敘事？這樣的視角帶來了

何種學術效果？作者發掘的新運的政治面向即「教養身體的政治」是準確和恰當的嗎？在新運中是否存在作者未發掘或未能展現的深層次的政治意涵？

### 三 何以身體？

隨着福柯 (Michel Foucault)、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 等知名學者的「身體理論」之形成，以及特納 (Bryan S. Turner)、希林 (Chris Shilling) 等學者對身體的研究<sup>⑦</sup>，二十世紀80年代以來，「身體史」成為西方史學界研究的熱點。一些海外漢學家也以身體的視角探討中國的社會史、生命醫療史、物質文化史等領域。台灣學者對身體的關注最早是在以醫療、疾病、生命為中心的社會史框架內發展起來的<sup>⑧</sup>。這些專題性研究所涉及的服飾、剪辮放足、女性身體、疾病醫療等方面，本身就是新運所關注的重要內容。深町英夫以身體的視角研究新運顯得十分恰當。

或許受到新文化史研究的影響，上述學者大多通過對人的身體觀念與實踐的探討，來呈現歷史脈絡中的社會文化因素，闡釋身體對社會文化變遷所具有的意義。然而，身體並不僅僅是生理的和文化的身體，更多時候是被政治建構的身體。依此理念，黃金麟融匯社會學與歷史學，以身體政治的視角考察近代中國身體生成史，並出版了多部有分量的研究成果<sup>⑨</sup>。值得注意的是，他有一篇文章專門以身體政治的視角來探討新運，認為國民政府為了使運動的訴求得到貫徹，

以一種全面醜怪的方式來銘刻既有的生活方式：「這個醜怪政治學的運作，除了使身體和生活直接成為國家權力施展的場所外，也能使醜怪的建構成爲國家規訓人民的絕佳藉口與管道。」<sup>⑩</sup>

與黃金麟一樣，深町英夫的研究也是從身體政治的視角出發，力求呈現新運具有的政治意義，而不是展現運動的社會文化因素。相較於黃金麟從宏觀的社會學角度的研究，深町英夫在本書中並沒有從抽象的理論層次來探討身體，也未介紹有關身體政治的理論，而是在爬梳大量的史料基礎上，把身體的視角融入對具體歷史事件或個案的分析之中，揭示了對教養國民而言，新運是一個非常政治化的過程。與福柯對身體進行描述時經常使用的「規訓」不同，深町英夫使用了「教養」一詞。儘管他未指明使用「教養」的緣由，但較「規訓」一詞而言，「教養」不僅契合古代中國君主和官僚教諭民眾的傳統，而且能凸顯國民政府看待國民身體的總體態度，也更能形象地描繪出國民黨在訓政時期對國民所充當的「訓政保姆」角色。

與既有研究新運的成果相比，本書從身體政治的視角對新運的系統性研究，具有很重要的學術意義。這可從研究方法、研究內容、敘事方式、洞察力四個方面體現出來。

在研究方法上，一方面，本書從身體視角出發打破了以往史學界研究新運的固有範式，呈現出各種類型的身體在運動中的形貌以及由身體負載的生命所具有的命運；另一方面，以身體生成的視角觀察歷

身體並不僅僅是生理的和文化的身體，更多時候是被政治建構的身體。深町英夫的研究從身體政治的視角出發，把身體的視角融入對具體歷史事件或個案的分析之中，揭示了對教養國民而言，新運是一個非常政治化的過程。

國民政府通過新運教養國民的身體，把國民的生活習慣作為否定、蔑視的對象，由此引起群眾對新運的懷疑乃至反感，以至削弱了運動乃至國民黨統治的合法性。

史的演變，有利於把許多零散、索然甚至不相關的史料串聯起來，使舊有的史料在新視角的關注下展現出獨特的魅力，也有利於發現運動在不同歷史時段之間所存有的連續性和共同特徵。比如，本書栩栩如生地呈現了新運對公務員、學生、銀行行員、店員、農民、婦女、兒童、傷兵的教養過程，也串聯起運動歷經的不同歷史時段，從而呈現出一幅新運的完整畫面。

從研究內容來看，本書從身體視角進行探討，在歷史的宏大表象之下挖掘出某些不為人知的歷史側面，對新運的歷史進程形成一種立體與多維的解讀。特別是作者展現了在新運中，國民的身體並不總是處於一種被動的狀態，有時還會主動地對運動作出抗拒和逃避，國民在運動中的多重形象被活靈活現地展現出來。身體在被教養的過程中並不總是溫順和俯首聽命的，而是會對教養進行曲解乃至逃避，以至生發出對教養的反感和厭惡之情。從而，以身體為視角進行的敘事能夠刻畫出身體所呈現的各種狀態，進而解釋新運的最終走向和歷史命運。

從敘事方式來看，圍繞身體的論述增加了本書的可讀性，又使其不失學理性。書中章節的標題，如「蘋果的回味」、「南昌行營爭寵記」、「蔣公的新衣」、「疑心生暗鬼」等，不僅可讓讀者聯想到身體的各種舉止，而且這些富有趣味的標題一改史學論著常有的嚴肅、枯燥的面貌，從而使論述如講故事般娓娓道來。此外，由於身體承載着特定的政治、社會與文化意涵，對各種

身體的「深描」揭示了新運所反映的歷史側面乃至歷史的整體趨勢。

從研究的洞察力來看，作者以身體生成史的視角發現，新運通過教養國民的身體並未能創造出近代國民，進而影響了國民黨的統治實效。對運動的發起者、領導者、執行者而言，新運是一種自我教養和教養他人的過程，因為他們在運動過程中必須率先垂範，才能勸導、感化、督促他人。然而，新運中的檢查活動與警察行政的界限趨於不明，日益呈現出暫時性和間斷性的特點。運動遭遇到國民陽奉陰違而變得戲劇化，實效甚微。國民政府通過新運教養國民的身體，把國民的生活習慣作為否定、蔑視的對象，由此引起群眾對新運的懷疑乃至反感，以至削弱了運動乃至國民黨統治的合法性。在內憂外患並存的情境下，蔣介石發起的新運與其說考慮通過培育國民認同以增強國民黨統治的合法性，不如說更加關注統治的有效性，從而增強政治效能。

正是由於統治的合法性面向在新運中體現得並不明顯，本文認為有的論者從「重建合法性」角度研究新運並不恰當。相較而言，深町英夫從身體生成史的視角研究新運的成效則比較成功。他正是以此視角反省新運創造國民的效果甚微的原因，指出：「這場運動期待每一個人對自己的一舉一動進行自律的、恆常的、持續的改良/控制，但其成敗只能通過以權力為背景的他律的、暫時的、斷續的監視而得到驗證，此即檢閱活動的難處。」（頁113）進而，「創造近代國民時所需

要的均勻化壓力只能由國家對社會的伴隨強迫力量的統治來施加。……缺乏『社會制裁』的中國只能通過『政治制裁』『法律制裁』創造出近代國民，但這種方式不可避免地具有根本性矛盾，即它會導致……運動本身的戲劇化」（頁114）。

#### 四 何種政治？

本書的末章「中國人是愛迪生嗎？」，通過「圍繞身體的政治」來探討中國近代化的宏觀意義，以及近代中國在世界歷史上所佔據的位置。作者認為，國民黨統治的正統性使它自認為是創造近代國民的典範，始終不能放棄創造國民的責任，於是通過由上而下的方式發起了新運，對國民進行「身體的教養」。這種「身體的教養」既是啟蒙和改良，又是監視和控制：「『身體的教養』確實具有個人服從國家的含義，不過前近代社會中的個人亦並非獨立於血緣、地緣、宗教等規範而能享受到自由的個體。從長遠來看，近代國民的創造促進了對個人的尊重，即每個人享有平等的政治權利和擁有一定的經濟條件。」（頁258）雖然作者點明新運的基本目標是通過對「身體的教養」來創造近代國民，然而並沒有指明這是甚麼類型或性質的國民，這種教養國民的方式是屬於自由主義類型還是法西斯主義類型？

西方自由民主國家對國民的教養採用啟蒙的方式，遵守嚴格的公域、私域界限，不干涉個人生活的細微領域。而國民政府對國民身體

的教養，不僅進行啟蒙，而且進行監視，甚至還進行懲罰。二十世紀30年代法西斯主義在世界盛行，國民黨領導人當時也頗受法西斯主義的影響<sup>⑩</sup>。法西斯主義嚴格規訓國民，監視身體的一舉一動，以形成統一的紀律和秩序。國民政府教養國民身體的某些方式十分符合法西斯主義的特點，如蔣介石在新運中多次強調，「全國國民的生活能夠徹底軍事化」<sup>⑪</sup>，「軍事化最後的目的就是要『整齊劃一』」，讓國民「要根據禮義廉恥，做到整齊劃一的程度」，「使全國國民個個能夠共同一致」<sup>⑫</sup>。

正因如此，海外漢學家多以法西斯主義視角來看待新運建設國家的嘗試。易勞逸(Lloyd Eastman)認為，蔣介石「通過復活儒家的道德觀和制訂人際關係的特別規定來使國家獲得新生」，並把對法西斯社會的想像，原封不動地納入新運之中<sup>⑬</sup>。與之類似，柯偉林(William C. Kirby)也認為蔣介石發起的新運試圖使德國法西斯主義的思想、組織與古代中國的傳統道德相結合<sup>⑭</sup>。但也許是因為受中國傳統道德觀的影響，新運並未完全採用法西斯主義無限制且絕對性的強制力，來全面監控民眾生活的各個方面。蔣介石曾指出運動的推行方法應該是「以身作則，示人模範」，「重感化而不事強制，先指導而後糾察」，由公務員及在校學生率先實踐，施行糾察的地點也應僅限於公共場所，而不包括私人住宅。他尤其強調「國家不必施以強制之法律，尤不宜由黨政軍人員一手包辦，致失人民群眾參加之興趣」<sup>⑮</sup>。

雖然作者點明新運的基本目標是通過對「身體的教養」來創造近代國民，然而並沒有指明這是甚麼類型或性質的國民。新運教養國民的方式並不屬於自由主義類型，也不屬於法西斯主義類型，而毋寧說屬於「國家主義」的類型。

可以說，新運教養國民的方式並不屬於自由主義類型，也不屬於法西斯主義類型，而毋寧說屬於「國家主義」的類型。事實上，新運對國民的改造無時無刻不滿足國家理性 (the reason of state) ⑰的需求。新運的主旨不僅僅在於創造近代國民，更在乎創造一個新的民族—國家。而這種創造新國家的方式則是把國民的身體與國家的建構相勾連，把身體納入國家建構的進程中，實現「身體國家化」。蔣介石在演講中經常把國民的身體乃至精神與國家相聯繫：「新生活運動的目的，就是要使我們一般同胞，個個人都能做健全的現代國民！要做健全的現代國民，第一就是要有強健的身體，有了強健的身體，就有強健的精神，有了強健的精神，就可學會一切強國的本領，有了各種強國的本領，自然可以保衛國家，發揚民族！使我們國家和民族能夠永遠適存於世界，不再受外國人的侵略壓迫，或遭受任何的輕視和欺侮！」⑱ 這段話明顯體現出蔣介石希望國民增強國家意識，達致國民身體「國家化」的意向。如果把新運放置於「大歷史」的脈絡中，與中國近代重要的國民改造思想或運動相聯繫，可以看出，這種「身體國家化」的過程其實是一個具有鮮明歷史時代特徵的舉措 ⑲。

本書只點明了新運創造近代國民的主旨，並未進一步發掘運動所反映的「身體國家化」的意涵，儘管書中引用的史料明顯體現出這樣一種趨勢。例如，作者引述蔣介石的心腹、新運重要設計者之一楊永泰對中國古代社會家族主義中的私德進行批判後，談到「禮義廉恥是

對國家、對社會的公德，而國家、社會都是無形、無聲的東西，是一種法人而非自然人，我國人向來只知道自然人的關係，根本就沒有法人的觀念」(頁54)；第五章所引用的熊式輝〈婦女生活之改進問題〉一文有言，「國家是由家庭集合起來的，家庭生活不合理，國家也不會強盛。換言之，必須有好的家庭，才有好的國家」(頁150)；第六章所引用的在「傷兵之友」運動中具有象徵意義的一句話也可證明此點，「我們軍人以身許國，我們的身體，不但是父母的身體，並且是國家的身體。所以我們要愛國家，必先愛自己的身體」(頁205)。這些都表明新運的主旨並不是簡單地創造近代國民，而是通過國民身體的「國家化」來達到「復興國家和民族」、「完成革命」、「報仇雪恥」等目的。蔣介石曾經在演講中多次把新運與國家建設、民族復興、報仇雪恥相連，認為「合乎禮義廉恥適於現代生存的新生活運動是目前救國建國與復興民族一個最基本最有效的革命運動」⑳。

「身體國家化」從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身體工具化」。新運把國民的身體和國家建構相連，使國民的身體服務於國家的建設。在近代中國，救亡壓倒了啟蒙，國家吞噬了個人，新運並不必然能創造出作者所認為的「對個人的尊重，即每個人享有平等的政治權利和擁有一定的經濟條件」的近代國民形象。

在國民政府面臨內憂外患的年代，新運成為一種特殊的以復興中國固有道德為憑藉的政治動員。這種政治動員試圖增強民眾的團體或國家意識，從而使個人的意志服從

作者並未進一步發掘新運所反映的「身體國家化」的意涵。「身體國家化」也意味着「身體工具化」。新運把國民的身體和國家建構相連，使國民的身體服務於國家的建設。



於團體或國家的目標。但與共產主義革命也主張使群眾身體「國家化」的努力相比，新運把國民單純地當成教導或規訓的對象，不試圖改變已有的社會結構以滿足國民的真實需求，也不試圖改變政治結構以提高國民參與的積極性。國民的參與在很大程度上淪為被動的，而不是積極的、民主的參與。

誠如史學家德里克 (Arif Dirlik) 所言，新運代表了國民黨克服國民與政府疏離的嘗試，以動員國民支持國家，在國民黨發動的改革中發揮作用。但這場運動不試圖挑戰，而是強化現有的權威結構，它的目標不是拓展國民的政治參與，而是動員國民支援國家的目標<sup>⑳</sup>。由於新運不僅沒有顧及國民切實的需求和利益，還試圖干涉國民的日常生活，因而沒有達到預期的成效，並於1949年告終。然而，這並不表示新運的一些理念完全在歷史中一直沉寂，國民身體的教養在之後的歷史乃至當代中國仍是一項未竟的課題。新運的歷史餘響也為國人思考身體的過去、現狀和未來提供了指向和借鑒。

## 五 新運的歷史餘響

新運創造近代國民的嘗試在近代中國並不是孤立的個案，如果我們以類似於年鑒學派 (Annales School) 所採用的「趨勢」(conjuncture) 角度來審視這一攸關身體生成的歷史主題，可發現創造近代國民是中國近代轉型中的一項頗為重要的任務。例如在清末，康有為宣導「公民自治」，以使四萬萬之民「進於愛

國，進於公益，進於自重，進於好施，進於學識」<sup>㉑</sup>；梁啟超宣導「新民說」，提倡「公德」意識<sup>㉒</sup>；嚴復亦有「苟民力已荼，民智已卑，民德已薄，雖有富強之政，莫之能行」之說<sup>㉓</sup>；蔡鐸還領頭發起了為時將近二十年 (1902-1919) 的「軍國民運動」<sup>㉔</sup>。當楊永泰闡述禮義廉恥是「對國家、對社會的公德」時，明顯繼承了梁啟超對公德、私德的論述，也把處於不同歷史時段但相似的主題串聯起來。

新運告終以後，其餘響在之後中國歷史的不同時期、不同地域被反覆地呈現出來。作者認為，「對於1949年以後相隔於台灣海峽而相互對峙的國共兩黨政權而言，通過『身體的教養』創造出近代國民這個課題仍然很重要」(頁255)。國民黨政權退敗台灣後，1966年11月孫科、王雲五、陳立夫等一千五百人聯名發起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次年7月以蔣介石為會長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成立，大會通過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綱要〉規定：「積極推進新生活運動，使國民生活在固有文化四維八德薰陶之下，走上現代化與合理化，同時政府應積極研究制訂完整之禮樂與禮儀，使中外人士均能體認我為禮儀之邦。」<sup>㉕</sup>文復運動承繼了新運的源流，所頒布的〈國民生活須知〉就很類似於新運中的〈新生活須知〉。隨着時空環境的轉變，文復運動也成為時代的遺產，成為台灣的歷史經驗<sup>㉖</sup>。

作者也把目光聚焦於當下中國大陸，認為中國大陸繞開了以「身體的教養」創造國民這一階段，加強了軍事和經濟力量，並提高了國

新運告終以後，其餘響在之後中國歷史的不同時期、不同地域被反覆地呈現出來。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承繼了新運的源流，所頒布的〈國民生活須知〉就很類似於新運中的〈新生活須知〉。

作者認為中國大陸繞開了以「身體的教養」創造國民這一階段，然而，中國大陸在國家建設現代化的實踐中也致力於通過「德治」創造現代國民。國家的治理者或執政者應該吸取新運教養國民失敗的教訓，以反思與明確當下中國應經何種途徑創造何種國民。

際地位，以富強為目的的國家高於個人的理念正在崛起（頁258）。然而，作者並未意識到，中國大陸在國家建設現代化的實踐中也致力於通過「德治」創造現代國民，如強調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性，宣導「以德治國」與「依法治國」相結合，提倡與宣傳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不可否認的是，創造現代國民對當下中國而言仍是一項重要的課題。歷史可為借鏡，國家的治理者或執政者應該吸取新運教養國民失敗的教訓，以反思與明確當下中國應經何種途徑創造何種國民。

新運的歷史餘響也留下了饒有趣味的問題。在本書的最後，作者通過「愛迪生少年時期不能適應學校的教育，但長大後卻成為著名的發明家，由此顯示出曾將其排斥的教育之缺陷」這一故事作為隱喻，提出了一個耐人深思、「尚未得出答案」的問題：「中國終究是通過其愛迪生般的獨創性的成功迫使人們改寫陳舊的『近代』教科書呢？還是現在的發展方式在不久的將來失去其有效性，不得已重新接受『近代』的補習呢？」（頁259）這值得讀者細加思考和品味。

總之，《教養身體的政治》一書以身體的視角細緻研究了新生活運動中的諸多人物和事件，揭示了新運的政治意義，與既有研究成果相比，在許多方面推進和深化了學界對新運的研究。本書雖然揭示了經由「教養身體」以創造近代國民這一新運的政治面向，然而並未深入分析國民黨通過新運所試圖教養的是何種類型的國民，尤其是沒有揭示新運具有的「身體國家化」這

一深層次的政治意涵。「身體國家化」意味着身體喪失了主體性而被工具化，或許其中蘊含着運動失敗的種子。新運與清末民初的國民改造思想或嘗試有契合或類似之處，它雖已成為歷史，卻仍留下了餘響。在當代中國的不同領域，教養或培育適格的國民或公民仍是一項未竟的課題。閱讀本書，有助正在處於、將會處於，或可能會處於「被教養」狀態的國人，在中國轉型時期得以知道身體的過去，並反思身體的現在與未來。

#### 註釋

- ① 參見《新生活運動綱要（附〈新生活須知〉）》，收入新生活運動總會編：《民國二十三年新生活運動總報告》（南昌：新生活運動總會，1935），頁121-38。
- ② 關志鋼：《新生活運動研究》（深圳：海天出版社，1999）。
- ③ 溫波：《重建合法性：南昌市新生活運動研究（1934-1935）》（北京：學苑出版社，2006），頁48。
- ④ 王曉華：《「模範」南昌：新生活運動策源地》（南昌：江西美術出版社，2007）。
- ⑤ 段瑞聰：《蔣介石と新生活運動》（東京：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2006）。
- ⑥ 日文版參見深町英夫：《身體を賦ける政治：中國國民黨の新生活運動》（東京：岩波書店，2013）。
- ⑦ 參見福柯（Michel Foucault）著，劉北成、楊遠嬰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修訂譯本（北京：三聯書店，2012）；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著，高振華、李思宇譯：《實踐理論大綱》（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特納（Bryan S. Turner）著，

馬海良、趙國新譯：《身體與社會》（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2000）；希林(Chris Shilling)著，李康譯：《身體與社會理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⑧ 有關海外漢學家以及台灣學者早期的身體史研究之介紹，參見劉宗靈：〈身體史與近代中國研究——兼評黃金麟的身體史論著〉，《史學月刊》，2009年第3期，頁88-89。

⑨ 參見黃金麟：《歷史、身體、國家：近代中國的身體形成，1895-1937》（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政體與身體：蘇維埃的革命與身體，1928-1937》（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戰爭、身體、現代性：近代台灣的軍事治理與身體，1895-2005》（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相關評價參見劉宗靈：〈身體史與近代中國研究〉，頁89-93。

⑩ 參見黃金麟：〈醜怪的裝扮：新生活運動的政略分析〉，《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30期（1998年6月），頁164。

⑪ Maggie Clinton, *Revolutionary Nativism: Fascism and Culture in China, 1925-1937*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7).

⑫⑭ 蔣介石：〈新生活運動之要義〉（1934年2月19日），載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十二卷（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頁78；77。

⑬ 蔣介石：〈新生活運動的意義和目的〉（1934年3月19日），載《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十二卷，頁141。

⑮ 易勞逸(Lloyd Eastman)著，陳謙平等譯：《流產的革命：1927-1937年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2），頁82-84。

⑯ 柯偉林(William C. Kirby)著，陳謙平等譯：《蔣介石政府與納粹德國》（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2），頁216-17、224。

⑰ 〈蔣委員長電京釋新生活運動真義〉，《中央日報》，1934年4月6日，第1張第3版。

⑱ 對「國家理性」的界定，參見邁內克(Friedrich Meinecke)著，時殷弘譯：《馬基雅維里主義：「國家理由」觀念及其在現代史上的地位》（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頁51。

⑲ 蔣介石：〈願人人力行新生活〉（1934年3月11日），載《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十二卷，頁112-13。

⑳ 中國近代「身體國家化」的研究，參見黃金麟：《歷史、身體、國家》，頁27-88。

㉑ Arif Dirlik,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 of the New Life Movement: A Study in Counter-revolutio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4, no. 4 (1975): 947, 953.

㉒ 明夷(康有為)：〈公民自治篇〉，載張枬、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一卷，上冊（北京：三聯書店，1960），頁177。

㉓ 梁啟超：《新民說》（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頁16-22。

㉔ 嚴復：〈原強修訂稿〉，載王栻主編：《嚴復集》，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26。

㉕ 對「軍國民運動」的研究，參見黃金麟：《歷史、身體、國家》，頁46-57。

㉖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綱要〉，載幼獅文化事業公司編：《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台北：幼獅書店，1968），頁505。

㉗ 對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研究，參見林果顯：《「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之研究（1966-1975）：統治正當性的建立與轉變》（台北：稻鄉出版社，2005）。